

欧美文学论丛 第四辑

# 传记文学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 目 录

前言 ..... 1

## 理论综述

“解释”与现代传记理念 ..... 杨正润 1

自/传中的本真叙事和认知叙事 ..... 大卫·帕克 36  
在忏悔中隐瞒？

——论西方自传的“坦白”叙事 ..... 王成军 59

从自传到自撰 ..... 杨国政 73

## 文本分析

鲍斯威尔和他的《伦敦日记》 ..... 韩加明 89

约翰逊传记《萨维奇其人其事》中的“虚”与“实” ..... 陈 茵 121  
面纱后面和面纱上面传来的声音

——析《从奴隶制中奋起》和《黎明前的昏暗》中的文体

与修辞技巧及其黑人身份认同问题 ..... 许德金 155

“谁解释过培根？”

——试论传记配角的阐释维度 ..... 赵白生 182

诗与真

——关于卢梭自传作品的一种解析 ..... 孙伟红 202

自我形象的构建

——乔治·桑的自传《我的生活史》散论 ..... 杨国政 227

一部共生的回忆录

——《哈德良回忆录》中作者的生命体验

与人物形象之交织 .....	段映虹 255
自传的精神化、诗意化及宗教化	
——凯勒《绿衣亨利》的三重解释 .....	谷 裕 273
“文学教皇”的自传 .....	黄燎宇 292
记忆的叙说：时代·我 .....	查晓燕 307
胡适与欧美传记 .....	王 琳 327
库切的三个背景 .....	赵白生 336

## 一部共生的回忆录

——《哈德良回忆录》中作者的生命体验与人物形象之交织

段映虹

自从福楼拜大胆地宣称“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之后，这一公式就落入了为评论家们所套用的命运。尤其是对于那些用第一人称写成的作品，这一公式的套用似乎就更加难以避免。因此，当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的《哈德良回忆录》(*Mémoires d'Hadrien*)问世后，立刻就有评论家断言，隐藏在哈德良皇帝身后说话的正是尤瑟纳尔本人：“哈德良，就是你。”这种说法令作家颇为恼火，她在回答记者的采访以及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到了这一说法之“粗俗无礼”和“愚不可及”。

尤瑟纳尔后来发表《〈哈德良回忆录〉创作笔记》<sup>①</sup>，追溯了这部作品成书过程中的一些关键事实，并阐明了自己所使用的创作方法。尤瑟纳尔强调，《哈德良回忆录》是“一个声音的肖像”，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她始终遵循的原则是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托，让哈德良本人说话：“我之所以选择用第一人称来写这部《哈德

<sup>①</sup> 《哈德良回忆录》于1951年12月在巴黎出版，《〈哈德良回忆录〉创作笔记》则最早单独发表在1952年11月的《法兰西信使》杂志上。然而自1953年《哈德良回忆录》第二版起，《创作笔记》就附于小说之后，并在其后的几乎所有版本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良回忆录》，为的是尽可能摆脱任何中介，哪怕这个中介是我本人。与我相比，哈德良可以更坚定和更巧妙地讲述自己的生活。”<sup>①</sup>

然而，《哈德良回忆录》毕竟是小说，而不是一部由当事人亲自撰写或者口述的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无论是简单化的“哈德良，就是你”，还是尤瑟纳尔本人对这一说法的断然否认，都不足以概括或者澄清事实。本文拟从追溯这部作品的成书过程入手，结合尤瑟纳尔在塑造哈德良这一人物形象的过程中自身生存状态和思想认识的变化，以期论证《哈德良回忆录》是一部历史真实与作家本人的生命体验紧密交织的作品。

与尤瑟纳尔的其他几部重要作品一样，《哈德良回忆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成书过程。

尤瑟纳尔对哈德良皇帝的生平产生兴趣，始于1924年第一次参观罗马郊外的哈德良行宫。在罗马皇帝中，哈德良不仅以其文治武功名垂青史，还以爱好文学艺术、尤其是醉心于希腊文化而著称。哈德良本人亲自参与设计的行宫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著名工程，位于一片林木葱茏、清泉流淌的坡地上，行宫里错落有致的建筑、精美的雕塑和艺术品、两座分别收藏希腊文和拉丁文书籍的图书馆，使之从落成之日起就成为引人瞩目之地。当二十岁的尤瑟纳尔来到这里时，近两千年的岁月风霜早已洗尽这座帝王行宫昔日的铅华。然而，也许颓垣断壁更容易激起年轻作家思古之幽情，她从荒芜的废墟中依稀辨认出行宫当年优雅精致的气质，从中看

<sup>①</sup>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创作笔记》，见《小说集》，巴黎，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82年，第527页。

到一位“尽力将艺术的精美与田园的惬意融为一体”<sup>①</sup>的主人。在年轻作家眼里,这位没有帝王之气的皇帝令她感佩不已。从这时起,尤瑟纳尔下决心写一本关于哈德良的书,按照她当时所心仪的形象,即作为“艺术家、热情的艺术爱好者、伟大的赞助人,也许也是情人”<sup>②</sup>的哈德良。

随后几年间,她写了几种完成或未完成的草稿,但最终全都付之一炬。一直到1939年赴美之前,由于其它写作计划,由于频繁的旅行,由于个人生活中的变故,哈德良的故事屡次被拾起又屡次放弃。然而,究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年轻作家尚未能进入哈德良的内心世界,哈德良的形象在她眼里还显得飘忽不定。在1934年的草稿中,只有一句话留在最后的定稿里:“我瞥见了死亡的身影。”尤瑟纳尔形容自己像一位不停地左右移动画架的画家,终于找到了作品的视点,那就是一个处于生命垂危之际的人回顾自己的一生。

“二战”爆发不久,尤瑟纳尔应美国朋友格雷斯·弗里克(Grace Frick)之邀前往美国。1939年10月,当她在波尔多登船赴美时,绝不会想到这次原本预计为期半年的旅行会无限期地延长,而她得以重返欧洲已是十二年之后的事了。在美国的最初几年,尤瑟纳尔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直到1942年9月,情况才稍微有所改观,她在纽约郊区的萨拉·劳伦斯学院找到了一个教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职位,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50年5月。这是她一生中惟一

---

①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创作笔记,见《小说集》,第540页。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明的是,虽然后来尤瑟纳尔对哈德良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她始终认为哈德良行宫“豪华而不排场,绝少帝王之气”。然而事实上,哈德良行宫却有可能是罗马帝国时期最为奢华的建筑工程之一,体现了皇帝本人“贪恋排场”的个性。见雷蒙·谢瓦利埃和雷米·布瓦诺的《哈德良皇帝》,“我知道什么?”丛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1—107页。

② 马蒂厄·加莱:《睁开双眼》,尤瑟纳尔访谈录,巴黎,百夫长出版社,1980年,第152页。

段靠薪水生活的经历。忧时伤生，尤瑟纳尔的写作几乎陷于停顿。当哈德良的影子偶尔浮上心头时，她甚至未免惭愧地想到，自己竟然有过如此异想天开的设想。所幸的是，尤瑟纳尔不是那种可以被日常琐事完全吞没的人。在这些世界和个人的前途都显得格外渺茫的年月里，虽然她未曾有意识地为写作关于哈德良的小说作准备，但日积月累的阅读仍然在不知不觉间为此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只要摒弃功利心，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终归是有用的。在异国他乡的这些年里，我继续阅读古代作家的作品：勒布·海恩曼出版社那些红红绿绿封面的书籍，成了我的又一个祖国。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重建其藏书。前些年，我不知不觉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往提布尔的书架上放书。此外，我只需想象一个病人，将浮肿的双手放在这些翻开的手抄本上就行了。”<sup>①</sup>

终于，一个意外的事件彻底扭转了尤瑟纳尔的生活轨迹。1949年初<sup>②</sup>，她收到一只从欧洲寄来的箱子，那是战前居无定所的她寄存在瑞士洛桑的一家旅馆里的。箱子里是一些劫后余生的票据、信件和旧文稿，其中包括她早年写下的关于哈德良的一部小说的片段。尤瑟纳尔后来喜欢将这只箱子的到来称为“扣动扳机”，因为眼前的旧文稿重新唤醒了她沉睡多年的创作欲望。从这时起，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重写这本书。随后的三年，她完全沉浸在公元二世纪哈德良的世界里。1951年《哈德良回忆录》在法国出

①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创作笔记》，见《小说集》，第524页。这里提到的提布尔(Tibur)，是意大利城市提沃里(Tivoli)的旧称，位于罗马郊区，哈德良行宫所在地。“病人”则指的是哈德良，他晚年因心脏疾病而双手浮肿。

② 关于这个日期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尤瑟纳尔在《〈哈德良回忆录〉创作笔记》中将这一日期写成1948年12月，七星文库版的“年表”中则是1948年11月或12月初。但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尤瑟纳尔的传记作者若斯亚娜·萨维诺在《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一书中的看法，即1949年1月。详见若斯亚娜·萨维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90年，第187—188页。

版,小说获得的成功大大超过作家本人的预期。至此,从1924年尤瑟纳尔产生写一本关于哈德良的书的念头,近三十年的光阴过去了。

## 二

1950年,尤瑟纳尔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目前正在紧张进行的创作:“我之所以跟您谈起这本完成了四分之三的书,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对从前‘我的作品’的肯定,同时还意味着连我本人也始料不及的发展和变化。”<sup>①</sup>这里所谓“始料不及的发展和变化”,指的就是尤瑟纳尔对哈德良形象的重新认识和定位。而导致这一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则是尤瑟纳尔写作陷于停顿的十年间,世界形势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造成的个人生活状态的变化。

从1939年尤瑟纳尔来到美国,到1949年她重新投入《哈德良回忆录》的写作,在此期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毫无疑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法国对德国宣战的当天,尤瑟纳尔正在从瑞士施也尔返回法国的路上。整整一天,在法瑞边境两侧的村子里,警钟长鸣不绝于耳。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那天早上,我在施也尔的一家咖啡馆里,听见收音机里传来开战的消息,以及希特勒的军队进入波兰的情形。就在同一天,坐在一艘穿越莱芒湖的空荡荡的邮船上,我听见从萨瓦<sup>②</sup>和瑞士两侧传来的警钟声,战争开始了。一阵阵巨大的声浪笼罩着邮船;我被罩在这张声音织成的网的中央,不由得

<sup>①</sup> 1950年3月8日,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致奥尔加·彼得斯的信,转引自若斯亚娜·萨维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第192页。

<sup>②</sup> 法国东南部地区,毗邻瑞士。



想起小时候在比利时海边度假时，走在沙丘上一路听到的警钟。这一次，七、八个城市或村庄的钟声一起鸣响，其中洛桑大教堂的钟声格外响亮。我孤身一人，了无牵挂，总之，除非出于我的选择，我并不特别属于任何地方，除非出于我的选择，我也不属于任何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仿佛感到自己的生命在消逝，它成了吞没这些声浪的漩涡；警钟已经不再意味着危险，它简直就是丧钟，为所有那些即将在这场冒险中丧命的人而鸣响，也许其中就有我自己；无论我去想象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也想象不出集中营里成百上千万的死者，乌克兰和斯大林格勒的万人坑，在德累斯顿和广岛被烧焦的成千上万人，在对英国的轰炸中、在缅甸热带丛林的征途中、在普兰尼加的战斗中、还有在芬兰的森林中的死伤者，以及从挪威到南斯拉夫被吊死的抵抗战士。<sup>①</sup>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幼的尤瑟纳尔在逃难路上还体会到一种近乎前去探险的莫名的兴奋，<sup>②</sup>那么“二战”爆发之时的亲身经历，则使已经成年的她对个人生命所面临的威胁有了切肤之痛。在上面这段自白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年来尤瑟纳尔一直自愿选择四海为家漂泊不定的生活方式，尽管她一向有意识地摆脱家庭甚至地域的束缚，尽管她一向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感到欣慰和骄傲，但在陷于警钟声所包围的那一刻，她也不免产生一种无所依傍的悲凉感。尤瑟纳尔本人并未如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在战争中丧生，但这场战争却以种种惨烈的方式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也引发人们对于人类社会所面

<sup>①</sup>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生前未发表手稿《关于自己的说明》。见若斯亚娜·萨维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附录之四，第503—504页。

<sup>②</sup> 尤瑟纳尔对于这段童年经历的叙述，见其家世三部曲《世界迷宫》之三《什么？永恒》，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随笔与回忆录》，巴黎，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91年，第1371—1375页。

临的种种危机进行严肃的反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有关哈德良的旧文稿回到尤瑟纳尔手中时,这位古罗马皇帝的生平向她呈现出了全新的意义:

那天晚上,我打开刚刚收到的那些书中的两本,它们都是四处散落的藏书的残余。一本是亨利·埃蒂安出版的漂亮的狄翁·卡西乌斯的著作,另外是一本普普通通的《奥古斯都传》。这两本书是了解哈德良生平的主要来源,是我当初想写这本书时买下来的。从那时到现在,世界和我本人所经历的一切丰富了这段古老的历史,在这位帝王的人生上投射下别样的光线和阴影。从前,我想到的主要是文人、旅行家、诗人和情人;这些形象丝毫没有消逝,但我第一次看见另一个形象极其清晰地显现出来,它在所有这些形象中最正式同时也最隐秘,那就是皇帝的形象。经历了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之后,我懂得了帝王的重要。<sup>①</sup>

虽然尤瑟纳尔早年的创作已经显示出她的思想异乎寻常的早熟,显示出她对于浪漫主义文学主观抒情和感伤情绪的警惕,然而,有限的生活阅历毕竟未能使她完全避免年轻文人容易沾染的通病,用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20世纪20和30年代,也就是说尤瑟纳尔尝试写作各种版本的哈德良故事期间,在欧洲各地漫游是这位年轻作家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并且在此期间她也有过几段可以称得上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因此,年轻的尤瑟纳尔从哈德良身上容易看到的,是一个文学和艺术的保护人、一位诗人、一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和一位既容易厌倦同时又最为深情的情人。比如有关安蒂诺乌斯的内容,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可以称为《哈德良回忆录》

---

<sup>①</sup>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创作笔记》,见《小说集》,第525页。

前身的那些手稿,但是有证据表明,在尤瑟纳尔 1924 至 1929 年间的试笔之作中,曾经有一个版本以哈德良皇帝宠爱的希腊少年安蒂诺乌斯为主人公<sup>①</sup>。安蒂诺乌斯自杀身亡后,哈德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定将这位生前既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也没有获得任何名分的年轻人尊为神,甚至使这位出身低微的美少年成为有史以来为后世留下最多雕像的人之一。哈德良这一近乎疯狂的举动,一直以来引起史家颇多争议,尤瑟纳尔之所以对此深感兴趣,无疑是从中看到了一位极富人情味的帝王。哈德良与安蒂诺乌斯之间的故事,在后来的《哈德良回忆录》中仍然占有大量篇幅,然而却再也不是小说的重心,而只是哈德良生平中无法绕过的一个环节,一段可以从中折射出哈德良丰富个性的经历。正如尤瑟纳尔所言:“倘若这个人未曾维护世界和平,未曾革新帝国的经济,他个人的幸福与不幸就不会如此令我感兴趣。”<sup>②</sup>

### 三

本文一开始已经提到过,尤瑟纳尔本人对甚嚣尘上的“哈德良,就是你”十分反感。如果说《哈德良回忆录》出版后,作家本人对这一说法的反驳多少带有为自己辩白的色彩的话,那么在此之前尤瑟纳尔写给德国作家布雷特巴赫(J. Breitbach)的一封信,则显得相当坦诚和可信。此信写于 1951 年 4 月,关于《哈德良回忆录》的出版,尤瑟纳尔当时尚未从出版商那里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她在信中写道:“我越写,就越体会到一种对事实以及对我试图接近的这个人物独一无二的个性无比的尊重。我尽力将任何阐释体系、任何文体上的框框以及任何个人的偏好弃置一旁,以让位

<sup>①</sup> 见若斯亚娜·萨维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第 189 页。

<sup>②</sup>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创作笔记,见《小说集》,第 530 页。

于准确和赤裸裸的事实。”<sup>①</sup> 我们知道,为了接近哈德良的世界,尤瑟纳尔阅读了得以流传至今的她认为哈德良阅读过的几乎所有书籍,即上文引述过的“往提布尔的书架上放书”的工作;她还多次亲自寻访过哈德良在世界各地留下的足迹;更不用说她为写作而查阅的大量相关历史文献。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方法:“一只脚立足于博学,另一只脚立足于幻术,或者更确切和不加隐喻地说,感同身受的幻术(magie sympathique),即想象自己置身于某人的内心世界。”<sup>②</sup> 尤瑟纳尔甚至指出,在写作过程中,为了使《哈德良回忆录》尽量符合哈德良本人有可能作出的叙述,当她感到皇帝在某些问题上没有道出实情时,她有意任其说谎;同样,她还尽力使小说有关哈德良生平的遗漏与皇帝本人记忆中可能出现的遗忘相吻合,正如人人都有撒谎和遗忘的时候。

我们并不怀疑尤瑟纳尔关于《哈德良回忆录》的上述说明,因为作品在史料上的扎实可靠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无需本文赘言。然而,无论尤瑟纳尔如何试图说明是作者努力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非反过来人物成为作者的代言人,《哈德良回忆录》毕竟是一部小说,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或人物传记,更非一部历史学著作。尤瑟纳尔所声称的“感同身受的幻术”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在小说家被允许的自由度内,作者也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了人物形象之中。

试举几例。

小说中描写了哈德良在继位前经历的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哈德良的前任图拉真皇帝固执地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与帕尔特人的战争陷入僵局,罗马军队伤亡惨重,而此时图拉真本人已病入膏

---

① 1951年4月7日,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致约瑟夫·布雷特巴赫的信,米雪儿·萨尔德和约瑟夫·布拉米编《尤瑟纳尔书信集》,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②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创作笔记》,见《小说集》,第526页。

育,帝位继承人问题却悬而未决。哈德良渴望继位以实现自己的和平计划,他更担心一旦图拉真突然去世,由于帝位虚悬,在尚未结束的对外战争之外又引发新的内战。然而,他对图拉真皇帝是否将传位于自己毫无把握。小说中,晚年的哈德良回忆起当时焦灼万分的心情:

我快要四十岁了。如果我在那时倒下,只剩下我的名字留存于一连串官员的名单之列,还有用希腊文撰写的纪念雅典执政官的碑文。此后,每当我看见某人在人生的中途辞世,而公众以为可以就此准确地评价其成败得失,我就回忆起在这个年纪上,我还仅仅存在于自己以及几位朋友的眼里,大概有时他们对我还有所怀疑,正如我对自己有所怀疑。我明白了很少人能在死去之前实现自己:于是我怀着更多的怜悯之情来评判他们的未竟之业。<sup>①</sup>

我们不妨看看,四十岁前后的尤瑟纳尔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上文说过,1939年10月,当尤瑟纳尔从波尔多登船前往美国时,她原计划六个月之后就返回欧洲。然而由于战争的原因,更由于格雷·弗里克的挽留,她从此就在美国定居下来。在美国的最初四、五年里,她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只能依靠干些零活谋生,比如商业翻译和私人法语课程。情况最好的时候,她应邀作一些关于法国文学的讲座,但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她和格雷·弗里克曾在距纽约一百公里左右的哈特福德居住过十年,但由于经济拮据,她们很少去纽约,尽管40年代初的纽约聚集了大批流亡的欧洲知识分子,而这个圈子对于远离欧洲的尤瑟纳尔具有的吸引力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到了40年代末期,当尤瑟纳尔收到朋友在欧洲替她找到的那只著名的箱子时,为了支付这只箱子运抵美国后

<sup>①</sup>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见《小说集》,第353页。

应付的关税，她还不得不卖掉手中珍藏的一本善本书。然而，与经济状况相比，更糟糕的也许是尤瑟纳尔的精神状态。她所热爱的欧洲正处于战火纷飞之中，她所眷恋的古老的欧洲文明正在遭受摧残，而她又不能或者说不情愿完全融入自己置身其中的新大陆文化。1940年6月，在原籍波兰的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纽约寓所里，她从收音机里听到巴黎陷落的消息时泪如雨下：“两人一起流泪，他们仿佛感到一个世界彻底终结了”。<sup>①</sup> 尤瑟纳尔本人虽然远离战火，自从在萨拉·劳伦斯学院上课以后，基本解决了经济上的困窘，但她却陷入了精神上的困惑。战前的尤瑟纳尔一直拒绝任何职业的束缚，既是为了获得创作所需的自由，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个性。如今迫于生计她却不得不落入某种体制的约束，这种生活方式显然有悖于她一向的人生理想。从各方面看，这都是一个艰难时世，尤瑟纳尔无法投入任何创作计划，甚至一度丧失了创作的信心。对于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以写作为终生志向的尤瑟纳尔而言，怀疑自己还能否写作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而丧失写作能力几乎就意味着丧失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令人昏昏沉沉的生活仍在继续。我没有任何来自法国的消息，也没有任何来自希腊的消息，我的沮丧如同大西洋一般深广。”<sup>②</sup> 这种沮丧中所包含的，除了对旧大陆的牵挂，除了日常生活的疲惫和艰辛，还有一层更深的隐忧，那就是自己作为作家的命运。正如在《哈德良回忆录》中，哈德良说：“我想得到权力。我想得到它是为了推行我的计划、尝试我的良方并修复和平。我想得到它，更是为了在死去之前成为我自己。”<sup>③</sup> 对于尤瑟纳尔而言，“在死去之前成为自己”又何尝不是一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

- ① 见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小说集》之“年表”，第21页。  
② 1942年1月20日，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致雅克·卡雅洛夫的信，《尤瑟纳尔书信集》，第73页。  
③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见《小说集》，第353页。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许多年之后，她对法国记者马蒂厄·加莱（Matthieu Galey）说了这样一段话：

对于一位作家而言，在四十岁上死去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如果托尔斯泰是这样，那是一场灾难；如果易卜生是这样，那是一场灾难；如果维克多·雨果是这样，同样是一场灾难。如果是这样，我们只有路易-菲利普治下巴黎时期的维克多·雨果，而不会有流放中的维克多·雨果。需要很长时间。写作《悲惨世界》和《世纪的传说》之前的雨果，是个优秀的诗人；但他还不是诗歌史上独一无二的先知。我无意贬低前期的雨果，甚至不贬低《颂歌与谣曲》，那是必经之路，但我认为，我们会对伟大的雨果一无所知。<sup>①</sup>

在这段谈话里，尤瑟纳尔谈的是作家个人的生活阅历对于创作的重要性。此时早已功成名就的尤瑟纳尔只是以假设的口吻提到其他一些作家的名字，却丝毫没有提及自己四十岁前后经历的一段精神危机。我们知道，尤瑟纳尔个性极强，除了极少数例外的情形，她从来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流露自己的脆弱、彷徨和消沉。时过境迁之后，她甚至习惯将这段长达十年的黯淡岁月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一个括号”，语气何其轻松！然而，当我们了解这十年间她真实的生存状况之后，我们确信，能否“在死去之前成为自己”曾是令四十岁的尤瑟纳尔极为焦虑不安的问题，虽然在上面一段与马蒂厄·加莱的谈话之后，她似乎只是漫不经心地补充了一句：“何况，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因此借哈德良之口说了出来”。

再举一例。深受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熏染的尤瑟纳尔，早年的世界观可以说是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瑟纳尔的世界观显示出一个深刻的转变，那就是对生态环境

<sup>①</sup> 马蒂厄·加莱：《睁开双眼》，第157页。

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建立在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关切之上，更由于她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只是宇宙中一个暂时的现象，自然是比人类更长久的存在：“我感觉到人类历史并不是全部，在历史背后还有地质。”<sup>①</sup> 尤瑟纳尔作为生态保护主义者的姿态在她成名之后才渐渐引人注目，但这种转变不是朝夕之间形成的。1942年，尤瑟纳尔曾应美国朋友伊夫雷特·奥斯丁(E. Austin)之约，将著名的安徒生童话改写为一部短剧《小美人鱼》。她在1970年为这个剧本撰写的前言中写道：

在我写作这个海洋之梦的时代，历史向成百上千万人显露出了丑恶的真面目，其中很多人在意识到这一点时失去了生命；就算由于偶然因素，我置身远处观望，我还是看见了我所看见的东西。正是从那时起，出于一种我至今仍然奉行的禁欲主义，较之从前我十分迷恋的保留着人类历史痕迹的风景，我渐渐喜欢上了尚未被人类的野蛮行为所破坏的风景，然而这样的地方越来越稀少了。……从考古学到地质学的兴趣转移，从对人类的思考转向对土地的思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时感到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尽管它最终令人获益良多。<sup>②</sup>

众所周知，哈德良是历史上最热衷于工程建设的罗马皇帝之一，在其统治期间留下了包括纪念性建筑、防御工事和民用设施在内的大量著名工程，除了上文提到的哈德良行宫，还有不列颠境内的哈德良长城、罗马城内的图拉真纪功柱和万神殿等等。尤瑟纳尔十分赞赏这些建筑在历史上曾经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们在艺术上

---

① 莫里斯·德尔克瓦编：《一个声音的肖像》，1952—1987年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二十三篇访谈汇编，巴黎，伽里玛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这一观点同样见于该书的其它多篇访谈。

②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戏剧一集》，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71年，第146页。



的成就,在她的笔下,哈德良是一位热情却不乏审慎的建设者:

建设,就是与大地合作:是在一片从此被改变的风景上留下人类的痕迹;也是参与城市生命演变的缓慢过程。要付出多少关切,才能找到修建一座桥或者一处喷泉的准确位置,才能赋予一条山路以最便捷同时又最纯粹的曲线……我重建了多项工程:这是与过去的时光合作,抓住或者改变其气质,是通向更为长久的未来的中转站;是在石头下面重新找到源头的秘密。<sup>①</sup>

在这段话里,包含着哈德良对于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应有的尊重,以及人类活动在历史长河中所占有的恰如其分的位置。谁能说其中没有尤瑟纳尔自己的声音?

再看看其它例子:

尤瑟纳尔很早就成为素食者,用她的话说,拒绝肉食是因为她“咽不下垂死的滋味”。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尤瑟纳尔仿佛一位颐指气使的城堡女主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她喜欢自己做面包,因为她喜欢触摸不同的物质以及从这种接触中产生的联想。她以欣赏的口吻谈到过18世纪时墨西哥的一位修女:“她说在为修道院做饭时,她会想到物质的转化,想到各种物质被消化然后重新构成身体的神秘过程。”<sup>②</sup> 同样,哈德良说:“贪吃是罗马人的恶习,然而我却从节制中体验到快感。……当我啃着军营里的大面包时,没有一次不产生美妙的感觉,这种沉甸甸的粗糙食物居然会变成血液、热量,甚至勇气。”<sup>③</sup>关于哈德良的饮食习惯,尤瑟纳尔承认自己在事实上添加了想象的成分:“在饮食上……我喜欢非常简单

---

①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见《小说集》,第384页。

② 莫里斯·德尔克瓦编:《一个声音的肖像》,第213页。

③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见《小说集》,第291—292页。

的东西。我让哈德良说了同样的话,何况,作为真正的西班牙人,他有可能喜欢比较俭朴的食物,但我想还不至于到那个地步。”<sup>①</sup>

尤瑟纳尔对旅行的兴趣一向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她终其一生是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对她而言,旅行的意义不仅在于领略大千世界的风景和人情世态,更在于旅途中的发现总是与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对精神自由的追求相伴随。哈德良一生纵横四海,在位二十一年期间有一半时间在意大利之外的行省度过,这在所有罗马皇帝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哈德良看来:“我在任何地方都是外来人,因此在任何地方我也并不感到特别孤单。”<sup>②</sup>而对于旅行的意义,哈德良显然道出了尤瑟纳尔的看法:“很少人喜欢长期旅行,因为旅行使人不断粉碎一切习惯,不断摆脱一切偏见。而我想尽力做到的,正是没有任何偏见和只有极少的习惯。”<sup>③</sup>

类似例子,不一而足。它们充分证明了在《哈德良回忆录》中,作者与其笔下人物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的契合,正是凭借这一契合,尤瑟纳尔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借人物之口表达出来。

#### 四

作家,或者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创作者在其作品中的位置,这是令尤瑟纳尔深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若斯亚娜·萨维诺(Josyane Savigneau)在为尤瑟纳尔所写的传记中,两次提到作家对于17世纪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支的《宫娥》迷恋不已。<sup>④</sup>在这幅著名的油画中,处于画面中心位置的是西班牙小公主玛格丽塔·特雷萨,周围是簇拥着她的宫娥和侏儒,公主身后的镜子里映出国王

① 莫里斯·德尔克瓦编:《一个声音的肖像》,第82页。

②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见《小说集》,第382页。

③ 同上,第381页。

④ 见若斯亚娜·萨维诺的《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第280页,第336页。

夫妇的影像。乍一看去,这幅画反映的似乎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的宫廷生活场景。然而,在画面左边的阴影里,手持画笔和调色板的画家本人傲然屹立,面前耸立着他正在绘制的作品。尽管置身阴影之中,画家的形象却无法抗拒地吸引着观者的目光。对于这幅作品会在观者眼中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绘画大师委拉斯贵支本人当然了然于心。而尤瑟纳尔之所以对这幅画着迷,究其原因,正在于其中隐含的艺术家在画中的位置及其象征意义,引发她思考自己在作品中的“可见性”这一问题。

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问题萦绕在尤瑟纳尔脑际。她是博尔赫斯去世前最后见到后者的人之一。1986年6月,博尔赫斯去世前六天,尤瑟纳尔前往日内瓦看望他<sup>①</sup>。尽管博尔赫斯仍然保持着很强的自制力与专注,但他毕竟已经十分虚弱。会面是短暂的,尤瑟纳尔不愿让对方过于疲劳,事后她却不免有些遗憾地提到,博尔赫斯的一句话一直在她的头脑中盘旋,可惜当时她却没有时间或者忘记了请他加以解释,那句话就是:“作家以为自己在谈论很多事情;但他留下的东西,如果他运气好的话,是一幅他自己的形象。”

尤瑟纳尔没有从博尔赫斯那里得到对这句话的解释,她本人也没有明确阐述过自己对这句话的思考,但她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形式的解答。尤瑟纳尔在与马蒂厄·加莱的谈话中,承认在写作《哈德良回忆录》的三年期间,她一直“与人物处于一种共生状态”<sup>②</sup>。尤瑟纳尔在这里使用了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共生”(symbiose),它指的是两个不同生物长期相互依存并从中共同受益的一种紧密关系。我们认为,不仅在《哈德良回忆录》的三年写

---

① 关于这次会面的情形,见若斯亚娜·萨维诺的《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第448页;以及尤瑟纳尔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见莫里斯·德尔克瓦编的《一个声音的肖像》,第411—414页。

② 马蒂厄·加莱:《睁开双眼》,第155页。

作期间,事实上,从早年开始酝酿这部作品直到最后成书,作者与人物之间始终处于这种共生状态。这种“共生”包含以下几重意义:

首先,如前文所示,小说《哈德良回忆录》经历了一个与作家的思想一起成熟的漫长过程。早在1927年前后,尤瑟纳尔在福楼拜的书信中读到这样一句话:“从西塞罗到马克·奥里略,这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时期,诸神已不复存在,耶稣尚未降生,惟有人的存在。”她终生将这句话铭记在心,她后来解释道:“我生命中的一大部分时间,将用于努力去理解,然后去描绘这个孤独而又与一切相联系的人。”<sup>①</sup>在尤瑟纳尔眼里,倘要描绘这个“与一切相联系的人”,哈德良丰富的人生经历显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一方面,随着尤瑟纳尔从年轻时代的文学幻想转向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真反思,她对作为历史人物的哈德良获得了逐步清晰和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随着尤瑟纳尔自身阅历的不断丰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作家充分利用小说创作的自由,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作为小说人物的哈德良形象之中,使之更加生动和丰满。

其次,《哈德良回忆录》不仅在尤瑟纳尔的作家生涯中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同时,这部作品还堪称尤瑟纳尔人生旅程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帮助作家走出琐碎的日常生活,走出消沉的精神状态,使她重新获得作为作家的自信,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如萨维诺在《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一书中指出的:“从二十岁起,她脑子里就有了那些未完成的故事……三十年代她曾尝试写哈德良,但由于没有找到准确的语气而放弃了。她确信只有完成这些人物的命运她才能完成自己的命运;在内心深处,她只有一个真正的愿望和一个真正的意图:通过写作成为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让自己的作品有助于人们,就像它们有助于自己那样,更好

<sup>①</sup>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创作笔记》,见《小说集》,第519页。

地对自由进行思考……”<sup>①</sup>

最后,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共生状态并没有因为《哈德良回忆录》的成书而结束。在尤瑟纳尔此后的人生道路上,她常常会在感到困惑犹疑之时与哈德良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她甚至会就一件具体的事情向哈德良征询意见,从他那里吸取勇气和智慧。而哈德良也因为尤瑟纳尔的创作,延续了他的故事在时间长河中一段短短的接力。<sup>②</sup>

<sup>①</sup> 若斯亚娜·萨维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第160页。

<sup>②</sup> 尤瑟纳尔说:“我写了一位帝王,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所经历的故事,如此而已。让一个存在过的生命在时间中延续一段短短的接力,总是令人愉快的事情。”见马蒂厄·加莱的《睁开双眼》,第166页。